

导 言

人才是人类之精华。毛泽东认为，一个人既有学问，又有阅历，这在一般意义上就可以称为人才了。以后，他又赋予人才概念以丰富的涵义。他认为，从人的知识水平看，凡人才大都掌握着比较全面的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并且具有把两种知识紧密结合起来的能力；从人的能力表现看，凡人才大都是指那些从各方面推动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他们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智慧和积极性；从人的品格行为看，凡人才大都是聪明人、老实人，即一切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人，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毛泽东对人才概念的论述是科学的，他揭示出人才的重要特征，即那些在某一方面有才学和能力，在某一领域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了较大贡献的人才称得上是人才。所以，人才也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先进群体。

中华民族古代思想史中积累了丰富的人才思想史料，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历代帝王将相在其统治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人才选拔、培养和使用制度，从人才理论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史料，从人才实践方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历代进步的政治家、史学家、科学家及有识之士，都非常重视人才研究，其优秀成果已成为中华民族流芳百世的宝贵文化遗产。例如，据《管子》一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政治家就提出了“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思想。《管

子》一书，力倡尊重人才，把尊重人才和合理的使用好各种人才视为英明君主之急务和成就王霸事业的大计。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最早提出“举贤才”的主张。他认为，自古以来政治上大有作为的君主，其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举用贤才。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就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写了一百多条史论，其中比较集中地谈到人才问题的有一半之多。在这些人才史论中，司马光纵观上起战国下终五代这 1362 年的历史，考证各个历史朝代的盛衰兴替，对人才的地位、作用、使用、管理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得出了“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的结论，提出了独具特点的人才思想。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有很多名君和有识之士都对人才问题发表了精彩的见解。纵观中国人才史论，可谓典籍浩繁，思想丰富，今天仍不失其后迪和借鉴作用。

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无产阶级人才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提出无产阶级用人育人理论。他们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既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党纲，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用人育才纲领。他们在同资产阶级论战中，首先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剥削阶级教育、提倡人的全面发展、普及义务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重要理论观点。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他早在 1893 年 12 月 19 日《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

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①列宁、斯大林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一再强调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掌握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列宁关于实践和群众的人才观，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有着深刻精彩的阐发。关于“干部决定一切”的人才观点，在斯大林的著作中也有精辟集中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在一百多年的无产阶级用人育人实践中，一直居于指导地位，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创新。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指导用人育人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在育才用人领域中不断取得新成就。他们坚持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人才思想和人才实践，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培育、选拔了众多人才，对我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核心的形成，对推动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我们党的人才发展史上乃至人类社会人才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人才思想是马列主义人才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五千多年来中国人才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随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②“出主意”就是领导决策；“用干部”就是选人用人。他在1938年明确提出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新中国成立后，他要求全国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务,使自己成为内行 并坚持拓宽选人视野,多方延揽人才,加大从党外选用人才的力度。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培养、造就并聚集了众多的杰出人才。他们竭诚尽智,艰苦奋斗,对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这也是我党队伍之所以能不断壮大,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能蓬勃发展的根本所在。毛泽东人才思想的意义和作用巨大而深远的。

邓小平人才思想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创立的人才理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随着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我们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邓小平从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出发,明确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针对干部队伍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不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状况,为中央制定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废除了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先后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实现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邓小平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局出发,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提出要在全党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等重要人才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邓小平人才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宝贵财富,为无产阶级的人才事业做出了新的卓越贡献。

江泽民人才思想是跨世纪的人才思想,是对邓小平人才理论的丰富与创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

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江泽民结合当今人类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特点，明确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和“科教兴国”战略，强调“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要求各类优秀人才做“三个代表”的实践者。江泽民人才思想对于新世纪我国构筑人才发展战略，开发人才资源，更好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带领中国人民走进新时代，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步伐必将大大加快，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和巨大挑战。中华民族要想在 21 世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在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努力培养大批既有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又懂科学，而且会管理的高素质领导人才，还必须加大力度培养新世纪建设人才，努力开创人才强国的工作新局面。

第一章 毛泽东人才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伟大思想,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是历史逻辑的必然。每一个时代的思想理论,都是该时代精神精华的反映。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反映时代精神的科学理论。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借鉴我国历代政治家的用人之道,并且用以指导用人实践,不断总结我党的用人经验,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才观,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毛泽东人才思想。因此说,毛泽东人才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不是主观的臆造,也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不断开发人才资源、总结用人经验而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节 毛泽东人才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国近代和现代的革命斗争,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切重大事件,才能知道毛泽东思想(含毛泽东人才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深刻揭示毛泽东人才思想形成的历史动

因，进而认识到历史英才在推动中国革命进程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一、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年代,是不断激起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年代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中华民族正遭受着深重的灾难，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民族失去独立，人民失去自由。从 1840 年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开始，到 1910 年的 70 年时间里，帝国主义联合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事件层出不穷。如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迫使中国赔银 2 亿 30 万两。1900 年八国联军武装占领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强迫当时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并赔偿 4 亿 50 万两白银。那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很多城市有殖民者的租界地，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中国人民蒙受了奇耻大辱。事实告诉人们，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加深。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清朝统治者不仅不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内修善政，外御强敌，反而压制一切有利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对外奉行一套卖国政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中国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总根源。但是，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压迫不消灭，反抗也就不会停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已经有许多志士仁人开始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英勇抗争，他们的代表人物是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

中国人民是富有革命传统的人民，中华民族是英雄的民族，从来不向外国列强屈服。我们的先辈，为了营救中华民族，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曾经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在毛泽东 16 岁时候，中国人民就已经进行了 70 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这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对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从 13 岁起开始阅读进步书报，宣传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道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使他看清了帝国主义的铁蹄如何践踏我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是如何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毛泽东很为祖国的前途担忧，他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我们的伟大民族面临列强瓜分、亡国灭种的时刻，怎能袖手旁观？怎能安心在家种田？毛泽东决心离开家乡，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于 1910 年 16 岁时，说服了父亲，到湘乡县立东山小学读书。从此，他走出了韶山冲，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更有利于增长学识和见识，为今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毛泽东成才迈出的关键一步。

二、毛泽东在旧中国的茫茫黑夜中，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中国的茫茫黑夜中，青年毛泽东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20 世纪 20 年代，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大事对他的思想教育最大、影响最深，那就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和 1919 年的中国五四运动。

1911 年春天，不满 18 岁的毛泽东离开湘乡，来到长沙，由此决定了他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离家前，他改写了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示了他立志求学和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决心。毛泽东到长沙后，先就读长沙一个中学校。在中学里，研究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会章，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运动。1911 年 10 月 10 日爆发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枪声震撼了青年毛泽东，他投笔从戎，报名参加新军当上一名士兵，过了半年军营

生活。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高峰，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终结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它有力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体系，开创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初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告夭折。中国人民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由于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其软弱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教训极为深刻。1912年4月毛泽东从这个部队退出，到长沙继续求学，一边学习，一边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对他以后成才影响很大。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了正在探索奋斗的中国人，使他们开始倾向社会主义，决定走俄国人的路，振兴中华。中国的大革命，将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将革命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里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1918年10月，毛泽东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抱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图大志，和他的挚友蔡和森，在长沙创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新民学会，而且那时就把‘准备人才’列为三大任务之一。他以新民学会为基地，促进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造就了何叔衡、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郭亮、蔡畅、向警予、罗新瓚、张昆弟等一批早期革命领导人才。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并同中国的工人运动日益结合。毛泽东在领导湖南的五四

运动中,深知‘革命需要人才,人才全靠培养’的道理。他亲自起草了长达数千字的《勤工俭学计划》,大力支持并亲自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和湖南的进步知识分子,到发生巴黎公社起义的法国,到列宁主义诞生的俄国,到世界其他一些发达的国家去留学,去了解世界大潮,学习革命经验。随后,他通过创办《湘江评论》、《文化书社》,建立‘俄罗斯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了马列著作和进步刊物,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号召全国民众的大联合,把‘三湘四水’的仁人志士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这时,毛泽东经过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推荐到革命先驱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有机会第二次系统的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毛泽东认定马克思主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面旗帜,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1920年,毛泽东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其后,他就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进一步集合五湖四海的贤能良俊,特别是无产阶级中的优秀人才,为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做好充分准备。

三、在早期革命斗争中注重培养革命领导骨干,由此孕育了毛泽东人才思想的萌芽

从建立中国共产党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国革命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敌强我弱的残酷斗争环境中曲折发展前进的时期。毛泽东以伟大革命战略家的眼光,认识到为革命事业聚集和培育大批领导骨干的重要性,由此孕育了毛泽东人才思想的萌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华夏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航船从此有了新舵手,换了新面貌。随后,开始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进行

北伐战争。毛泽东作为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把培养人才的工作摆到了各项工作的首位。

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秘密地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所干部学校。他亲理教务，培养了蒋先云、杨开慧、夏明翰、柳直荀、毛泽民、黄静源等200多名革命领导骨干。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长沙、安源等地还创办了各种工人夜校，他曾四次巡视安源的工人运动，每次都提出要创造条件培养工人运动的人才。他先后选派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等去安源工作，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工人夜校，培养了数百名工人运动人才。他们中有的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坚，有的参加了北伐战争，有的参加了秋收起义，有的后来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1924年至1927年，毛泽东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包括在广州和武昌两个阶段。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最初是在彭湃同志指导下于1924年7月在广州创建的，是中国历史上以造反为目的而训练农民骨干的学校。毛泽东于同年8月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课。1925年毛泽东亲自开办第五届讲习所，这一届300名学员中，湖南学员占三分之一多。1926年，他亲自主持讲习所工作，专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又主编和创办了《农民问题丛刊》，介绍和交流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开设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程，提倡课堂质疑问难，运用全新的教学方法，有讲有习，将课堂搬到海丰现场，让学员观摩学习彭湃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实践。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亲自组织和挑选了15名教员，其中包括周恩来、肖楚女等。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大革命时期培养农民运动人才的摇篮，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的农运骨干，在这里受训之后，

回到各个地区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又由他们办了一些地区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地发展，短期内就有亿万农民在我国的中部、西部和北部各省组织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建立农会，发展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支援革命军北伐，农民的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选集》第1卷虽然只收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两篇文章，但都论述了人才问题。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写道：“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① 这段关于革命领导阶级的论述，虽然未明确提出人才的概念，但却蕴含了群体人才作用的思想。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② 他还明确指出：“……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③ 上述评论，标志着毛泽东人才思想已绽出了初蕾。

第二节 毛泽东人才思想的拓展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和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候，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极度仇视国民革命。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于1927年春夏之交相继背叛革命，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把枪口对准人民搞突然袭击。4月12日，国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页。

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时在中共中央处于领导地位的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拒绝接受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正确主张，使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恶浪里，大量优秀革命领导人才惨遭反革命屠杀，几十万革命群众的鲜血抛洒在黄浦江里、南京路上、长沙街头和祖国的城乡。还有不少忠诚于革命事业的骨干预党失去联系，革命力量大大削弱，革命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持续三年多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惨重失败。

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临危不惧，拨乱反正，聚集人才，力挽狂澜，决然带领秋收起义未达预定目标的一支不足千人的工农革命队伍，由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大进军，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星火。在敌人统治薄弱，又有革命基础的井冈山上，成功的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新风暴。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期，迫切需要大量人才开展工作，而当时建立起来的一个个红色政权，都处于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山区农村中，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环境里，能否解决又如何解决革命发展所需要的人才问题，尖锐的提到了党的工作议程上。善于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毛泽东，对开发新的人才资源作出了新的科学决策，即：就地取材，加紧培训。他带头在宁冈县蓑市的“龙江书院”，办起了红军的第一个教导队，培养部队的军政人才。取得经验后，又根据苏区建军、建党、建政的需要，号召用革命精神发展苏区教育，培养各种人才为革命战争服务。他强调，要“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并开设了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工农红军大学、高级师范学校以及各种技术学

校和特科学校，组织干部和战士学习马列主义，学习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为了办好各类学校，他挑选了既热爱教育事业又有办学才能、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有名望的教育家徐特立等，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并由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同志，兼任各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员。毛泽东兼任了苏维埃大学校长，朱德兼任了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长，刘伯承兼任了彭杨步兵学校校长，徐特立兼任了中央高级师范学校校长，叶剑英、刘伯承、何长工等人先后兼任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或政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董必武、邓小平、刘伯承、萧劲光等许多领导同志，都到各个学校去授课，从原有文化程度很低的工农干部中，培养出一大批革命事业急需的军政人才和建设人才，并使这些人才从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自觉克服了小生产者的传统观念，成长为工农红军和红色政权的领导骨干。

领导英明，路线正确，人才得力，作战勇敢，红军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使一小块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发展到多块、大块，遍及全国十多个省 300 多个县的广大农村，而工农红军和党的组织则分别发展到 30 多万人。中国革命从低潮中又重新走上了复兴的道路。

毛泽东的人才思想与实践在拓展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各种错误路线的干扰与压制，尤其是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最大。从 1931 年 1 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就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了一条比过去的“左”倾错误形态更为完备的“左”倾错误路线。尤其是临时中央于 1933 年从白区迁入中央苏区后，这一错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他们在思想上大搞教条主义，在政治上大搞机会主义，在军事上大搞冒险主义，

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他们打着“改造党和红军”“改造与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旗号，把执行王明路线的一些人，派到各个根据地去夺权，对不同意、不执行王明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一大批忠诚革命事业、坚持正确路线、拥有丰富经验和卓越才能的领导干部和优秀人才，遭到不应有的打击与迫害。他们首先排斥了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又打击了执行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许多同志，把整个苏区搞得人心惶惶，极不正常，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恶果，丧失了“九一八”事变后发展革命力量的大好形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惨重失败，丢掉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所有革命根据地，使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最后在一片混乱中被迫撤出苏区。在向湘西转移途中，他们又实行逃跑主义，突破敌军四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 8 万人降到了 3 万人，损失 5 万人之多。如果不是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改变原定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向贵州推进，还要遭受更大的损失。留在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的 3 万多红军，除由陈毅率领的一部分游击队保存下来外，其余在红军主力撤走后，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与封锁，损失惨重。从其他根据地撤走的红军，除由粟裕等率领的少数部队突围外，也遭到了严重损失，牺牲了不少优秀人才，方志敏、寻淮洲等先后殉难，整个红军从 30 万人降到 3 万人。

正当中国革命濒临覆灭的危难时期，红军中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与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长征到达遵义时，强烈要求改变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渴望毛泽东同志回到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有些犯过“左”倾错误的人也开始觉悟，反戈一击，站到了反对“左倾路线”的立场上。1935 年 1 月，在

毛泽东等同志的倡议下，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自从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方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岗位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贤能良俊，共商军机要事，指挥工农红军，跳出敌军重围，坚持北上抗日，到陕北去落脚。在这一过程中，他得到了周恩来、朱德、陈云、叶剑英、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李富春、张闻天、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协作。接着，党中央又解放了被王明路线迫害的干部战士，使他们各自回到了原来的战斗岗位上，并加强了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扩大了红军，广集了人才，增强了广大指战员对革命的坚定性。他们按照毛泽东的军事布置，四渡赤水，声东击西，智调滇军，乘隙北进，很快摆脱了 40 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夺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其后，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在极端艰险的长征路上，经过 300 多次战斗，历尽千辛万苦，跋涉万水千山，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集结人才，扩大红军，挽救了被王明路线造成危机的陕北根据地，领导了“一二九”救亡运动，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王稼祥等同志前往西安，正确解决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随后在全国范围内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开创了抗日救国的新局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论述到人才的文章有 10 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人才思想形成时期，其主要标志是：